

烽火岁月

杨献珍在山西

● 萧岛泉

烽火岁月

——杨献珍在山西

萧岛泉

杨献珍哲学思想研究所

著 者:萧岛泉
编 辑:杨献珍哲学思想研究所
责任编辑:饶咬成
印 刷:郟阳师专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7
字 数:120千字
工 本 费:15.00元
印刷时间:2000年4月3日
准印证号:[2000]鄂十丹图内字第018号

目 录

一、奔赴山西，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
二、接办“牺盟会”，妙手修订“牺盟会”纲领	39
三、开办各类训练班，培训党的军政干部	65
四、担任《政治周刊》特约撰稿人，占领舆论宣传 阵地	80
五、召唤故乡热血青年，驰骋疆场抗击日寇	95
六、悉心探查太原监狱，大力营救王若飞出狱	124
七、打破阎锡山的框框，大力转变工作方针	142
八、开办抗日游击学校，创建抗日游击武装	168
九、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支援八路军抗战	202
十、反叛逆斗顽敌，应付突然事变	209
十一、痛斥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总结 血的历史教训	223

一、奔赴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9月24日，是杨献珍结束他一生中第二次牢狱之灾的日子。杨献珍出狱的消息，由牛保正告知胡孝先后，胡孝先夫妇就像遇到天大的喜事似的，欣喜异常，雀跃不已。当天，他们夫妇一大早就赶到草岚子监狱，将杨献珍接到宣武门教子胡同鄯阳会馆，从会馆中特意挑了一间比较宽敞明亮的房间，置备了一套整洁的被褥，让他住下，好好休息，恢复一下身体。为了尽同乡之谊，当晚胡孝先还特令他的妻子亲自下厨房为杨献珍烹调了一桌丰盛的具有鄯阳风味的家宴，一洗杨献珍狱中褻秽浊气。席间，宾主双方除了畅叙别情、谈论时局外，胡孝先还郑重其事地向杨献珍提议，待他略事休息若干时日，身体得到康复后，他即去车行包一辆黄包车，陪他到北平各大名胜古迹，好好游览一番。北平乃千年古都，百代重镇。它襟带风华，雄峙燕赵，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江淮，枕居庸，联朔汉。历商周，经汉唐，又经金、元、明、清四朝经营，集五千年古国之文明，成举世罕见之名城。自辽金以下及至元、明、清各代，北平就为京畿之地。辽时称其为南京（燕京），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清两代称之为北京。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

也驻扎于此，直到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才把北京改称北平。杨献珍五年前奉胡鄂公之命到北平执行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不料脚跟还未站稳，第二天就被捕入狱了。因此，北平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他也不知道。杨献珍生于农村，自幼酷爱大自然，游历祖国名山大川，寻访各地名胜古迹，是他生平的一大夙愿。加之，他喜读史书，因此，每到一地凡有名胜景点，他必仔细考证观察，寻根问底，以至常常流连忘返。现在，胡孝先提出请他游览北平古都，自然甚合他的心意。然而，杨献珍却婉言谢绝了胡孝先老先生的一片盛情厚意。原来此时的杨献珍虽然挣脱了牢狱的桎梏，但在他的心中却仍时刻装着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几十名战友的安危。战友们仍在烈火铁窗之中苦苦煎熬，他怎能有踏访名胜古迹和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呢？后来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这几十名共产党人是分期分批先后出狱的。杨献珍和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韩钧等九人是第一批出狱的。在他们出狱后，至少还有 40 余人被关押在狱中。当时，监狱当局规定：凡被释放者，每人都必须要找两个担保人，如果找不到两个保人，你就休想走出监狱的大门。而仍被关在狱中的那些战友们，他们绝大部分在北平都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找到担保人，对此，杨献珍从跨出监狱起，就一直思谋着如何为战友们解决这个问题，让战友们尽快地走出牢门。因此，当胡孝先提出陪同他浏览北平的名

胜古迹时，杨献珍不由动情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拱拳向胡孝先夫妇致以深深的敬意，对他们夫妇这些年来对他的关爱、帮助以及出狱后对他周到细致的安排、无微不至的照料，表示由衷的感激，但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拂逆了胡孝先邀他共游古都胜景的美意。

一生饱历沧桑，而又善解人意的胡孝先眼见杨献珍虽飞出了樊篱牢笼，但仍似有难以排遣的思绪压在心头，便要杨献珍把问题如实地向他们讲出来，以便大家共谋对策。

杨献珍五年的牢狱生涯，已经给胡孝先夫妇增加了无穷的麻烦和繁重的负担，致使杨献珍每想起来都感到深深的不安。此时，他实在不忍心再给这位故乡的长者增加新的负担和麻烦了。但是，在胡孝先的一再催问和诚挚的关怀下，杨献珍禁不住还是把他正为尚在狱中关押着的战友寻找担保人而焦虑的心事向胡孝先夫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胡孝先当即慨然允诺，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帮助杨献珍处理好这个问题。胡孝先一向快人快语，说到做到，从不轻诺寡信。果然，在此后的大约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胡孝先一直四处奔波，调动了他在北平的所有亲朋好友和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向他们做工作请他们出面为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杨献珍的难友充当保人，从而解决了不少同志请不到保人的问题。

与此同时，杨献珍还找到了当时在北平以搞帮会活

动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魏文伯的侄儿王伯平(魏梦龄)，请他找他的青红帮朋友出面为狱中无法请到担保人的同志作保。经过王伯平的积极周旋，狱中同志的保人问题便完满地得到了解决。

对于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从一开始同志们就存在着疑虑，后来在党组织的再三催促下，尽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大家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但也有少数同志心存疑虑。其中最典型者，如刘锡五同志，他听了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传达后，虽然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提出不要把他列入第一批出狱人员的名单，并要求第一批出狱的同志出去后，要进一步核准核实情况。如果确实是北方局和党中央有此指示，就请杨献珍托人给他送一只烧鸡进来，若是情况有误，以后就不必再管他了，他一定要把牢底坐穿。

在积极运筹谋划为大家解决担保人的同时，杨献珍没有忘记刘锡五这位为人忠厚耿直、性格倔强、对同志满腔热忱、对党无比忠贞的难友对他的信赖和嘱托。一天他特地跑到街上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道口烧鸡，交给胡孝先，请他派人送到了草岚子监狱，从而使刘锡五拂去了蒙在心头上的疑云，于10月底和最后一批同志走出了监狱。

薄一波、杨献珍等首批同志出狱后，在孔祥祯的帮

助下，很快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北方局派徐冰在太庙（即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座茶馆里与薄一波接上了关系，由孔祥祯在茶馆外边负责望风。徐冰向薄一波要了他们首批出狱人员的地址并交待了接头暗语后，当即又报告了当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然后，由柯庆施再找薄一波等人联系接头。柯庆施和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等人接上关系后，在同他们谈话时，还不无幽默地对他们说：“让你们出来是根据胡服（即当时刘少奇的化名）同志和北方局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做出的决定，没想到你们像诸葛先生似的还摆架子，必得三顾茅庐才肯出山。”

1936年是中华民族寇深祸亟、国难民危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抗日爱国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一年。当时，华北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异常严峻。继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1932年在上海又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事变之后，尽管驻守在上海的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不畏暴敌欺辱，奋起抵抗，连挫敌军，迫使日寇三易其帅，但最后却仍被媚颜事敌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纸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把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变成了只许日本驻兵，不许中国军队设防的城市。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更加嚣张。自“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就把侵占

我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察哈尔作为主要目标。此时，驻守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驱使着大批日军的铁蹄由热河而绥远、而榆关（即山海关）、而滦州、而通州，一路向关内扑来，直逼北平城下。并凭借着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它们签订的《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等等一连串的卖国条约，不断地大批向华北增兵，妄图不战而攫取我华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主权。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还施展魔腕、玩弄鬼蜮伎俩，在河北和内蒙收买和网罗了国民党亲日派、蒋介石的代理人、卖国贼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汉奸伪军李守信、王英、金宪章以及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等一小撮民族败类；在河北通县、香河以东 22 个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组织了“内蒙自治政府”。为了加速推行华北地区为它们的“第二个满州国”的罪恶图谋，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将华北的兵力由原来的 5000 人猛增到 25,000 人，而且还在天津成立了“华北驻军司令部”，把它们的大批汉奸、特务和日本浪人撒向各大城市，搜集情报，寻衅闹事，挑起争端。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竟穷凶极恶地宣称：“华北一旦发生自治，日本愿意援助。”“任何中国人倘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动关东军的兵力”。其态度之蛮横、气焰之嚣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华民族真正到了存亡绝续、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凶恶残暴的侵略毒焰面前，国民党政府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剿灭红军的政策，一方面仍胡说什么：“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继续顽固地坚持其不抵抗的对日政策，妄图以妥协投降的办法，来换取偏安一隅的局面；同时对国内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则大肆镇压，到处制造逮捕、监禁、杀害共产党人、抗日爱国人士的恐怖事件。对于共产党和红军则更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誓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然而，中华民族是万古不衰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千百年来，英雄的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祖国的生存发展，为了抵御外国列强的疯狂入侵，从来没有向任何邪恶势力和艰难险阻低头屈服。在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着中国历史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热爱祖国，为国捐躯，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他们身体力行，为民请命，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团结战斗，奋起反抗外敌入侵，同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永远保持着中华民族的神圣感情和不可磨灭的性格特征。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猖狂侵犯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

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在中国共产党发出的这一最强音的感召和影响下，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屈辱的对日政策的呼声和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此伏彼起开展了起来，汇成了一股排山倒海的抗日洪流。

——在西北，胜利完成 25,000 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将陕北作为革命落脚点后，党中央在日本侵华战争急剧升级，中华民族的存亡到了危险的时刻，正确地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于 1935 年 12 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实行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出：陕北苏区的地位是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卫——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之成为抗日的领导中心和革命根据地，并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将反蒋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免遭亡国惨祸，中国共产党和弱小的红军也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转变，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目的，我们党坚持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与上层的）的政策和策略，发动、团聚与组织全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

一致抗日。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抗日，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还提出：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础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以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从而使每一个反日的中国人都能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来。

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我党战略政策及时而迅速的转变，使面临亡国灭种惨祸的中华民族，从此获得了活力，获得了生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与驻扎在陕甘一带担负着国民党政府“围剿”陕甘苏区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西北军司令杨虎城，频频接触，友好协商，最后终于取得共识，达成协议，使张、杨两将军的部队和我党领导的红军形成了三支联合抗日的力量，从而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剿”陕甘苏区的计划，巩固了陕甘苏区这块抗日救国的前卫阵地。

——在华北，经过“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战斗洗礼的华北民众，虽然在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当局的残暴镇压下，一度暂时处于低潮，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却深深地根植于广大民众乃至统治阶级的某些上层人士的心目之中，对于推动以后华北的抗日救亡运

动仍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在这时,党中央派刘少奇(化名胡服)于1936年春抵达天津就任中央代表(后为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任后,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党的新的战略方针,他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许多文章,对党的路线、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开展了党内教育和一系列的实际工作;强调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把着眼点放在蓄积力量准备作战上,切实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建立、巩固、扩大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存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加强平津市委的工作,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并兼顾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组织的建立。对于过去平津学生运动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对待29军和宋哲元的问题,刘少奇也都一一作了细致的部署和安排。因此,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较短的时间里便由低潮迅速地高涨起来。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平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大城市逐步转入了城镇乡村,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广大的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血腥镇压,于1936年1月2日至4日组成了500余人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冲破军警宪特的重重堵截包围,分期分批奔赴北平、天津、

大兴、宛平、安茨、固安、任邱、安阳、保定等县的农村城镇，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整个活动前后历时 20 余天，行程 700 余里。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城乡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这些青年学生于 1 月 22 日汇集到保定后，在保定成立了“民族革命先锋队”筹委会。随后，又于同年 2 月 1 日在北平召开了各队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革命先锋队的“斗争纲领”、“组织系统”和民族革命先锋队“民先规约”。1936 年 12 月又在北平召开了民族革命先锋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民族革命先锋队总部。民族革命先锋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组织，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阶级、派别、信仰、出身均可参加。由于其组织的广泛性、群众性，该组织成立后不久，即由 300 多人发展到 6,000 多人，其后又迅速由平津发展到上海、武汉、广州、太原、运城、西安、南京、济南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甚至发展到东京、巴黎、里昂、伦敦、纽约等国外爱国青年华侨中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在东北，自“九·一八”张学良在蒋介石“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撤离东北后，东北的 3000 余万民众，200 余万健儿，并没有在日寇和蒋介石的屠刀下屈服，他们各疏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与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他们组织起抗日义勇军、

抗日自卫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大刀会、抗日山林会等各种抗日武装，奋起与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进行殊死的斗争。1936年2月全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组成了抗日民主联军第一军至第七军，到1936年下半年又先后增编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等四个军。这支总数约40,000余人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在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赵尚志、魏拯民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率领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像一把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不仅牵制了日寇向中国内地侵略的力量，而且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变我东北三省为其永久殖民地和战略后方的罪恶图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华东，发生于数年前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虽然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无耻叛变下，导致了失败，但是由淞沪抗战孕育出的抗日反蒋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一直鼓舞着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广大民众。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及时地先后派遣冯雪峰、潘汉年等同志前往上海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冯雪峰等同志到上海后，在鲁迅、茅盾、沈钧儒等人的帮助下，上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工作，便很快达到了预期的效果。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即救国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会议选举著名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

等 40 余人作为执行委员，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等 14 人为常务委员。大会宣言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华东地区以及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华南，随着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下，此时在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于 6 月 1 日发动了两广事变，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领导抗日，并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北上抗日。此次事变，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以及其它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在华南和全国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绥远，时任绥远省主席、35 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在国难当头、民族严重危机面前，毅然抛弃了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先后在绥东的红格图和绥北的百灵庙等战略要地与日寇和伪蒙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战斗中，傅作义将军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在 35 军广大官兵勇猛顽强，奋力拼杀下，不仅一举收复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格图镇，而且长途奔袭 150 多公里，胜利地夺取了日伪进犯绥远基